

# 公民问政策略与政府回应性

——以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为例\*

郑冰岛\*\*

**[内容提要]** 提高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从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爬取的8928条公民诉求帖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与市民在网络空间进行政治互动的一般特征,并考察网民问政策略与政府回应性的关联。研究发现,重庆市政府对公民网络问政帖的回应率总体较高,尤其是基层区县政府对网民诉求响应积极,且政府对民众不同议题的诉求回应并不呈现显著的选择性。网民的问政策略构成政府回应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些诉求明确、关注度高、涉及多重议题,以及影响到民众集体利益的诉求帖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有效回应。

**[关键词]** 政治互动,政府回应性,网络问政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terminants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China during the digital era. Using data based upon the digital footprints of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s on a political forum established by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e highly responsive to citizens' appeals, and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ir responsiveness is selectively distributed across various policy domains. We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the responsive rates differ by citizens' posting strategies: shorter posts that get more hits, and those pertaining to multiple policy domains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 are more likely to get timely and effective replies.

**[Key Words]**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Online Political Forum

---

\* 本文的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2BZZ084)资助,为其阶段性研究成果。

\*\* 郑冰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一、引言

政府回应性,即政府积极关注公众利益,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意愿与能力,正逐渐成为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研究重点(Besley and Burgess, 2001; Selden, 1998)。不少文献致力于探讨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试图总结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具有哪些特征的政府,其制定的公共政策更符合民众诉求(Cleary, 2007; Speer, 2012)。尽管这些文献的研究场域不同,具体的实证发现也各有差别,但它们之中的绝大部分立足于同一个理论出发点:选举制度下的连任压力构成政府回应性的最根本来源(Dahl, 1971; Hobolt and Klemmensen, 2008)。从这一观点出发,许多研究将选举竞争看作实现良好公共治理的不二之途(Beer and Mitchell, 2004; Diamond, 1999; Powell, 2000; Przeworski and Limongi, 1993)。

虽然这一观点由来已久,但最近的社会科学实证发现却对其提出了重要挑战。首先,研究发现许多与选举竞争无关的民众政治表达也能得到有效的政府回应。在很多情况下,当官员连任与否并不受民众舆论影响时,他们仍然选择保持其决策与公共偏好的高度一致(Cleary, 2007; Hirschman, 1970; Putnam, 1993; Kuklinski and Stanga, 1979; Verba et al., 1995)。其次,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在选举制度下,政府也只是选择性地回应民众诉求(Grimes and Esaiasson, 2014)。诸多实证证据表明,相比于社会弱势群体,那些掌握经济、政治与社会网络资源的强势群体更多地左右着公共决策。民众选举出的政府对强势群体的偏好更具回应性,而弱势群体的诉求则更可能被选择性地忽视(Adams and Ezrow, 2009; Bartels, 2008; Bernauer et al., 2015; Broockman, 2013; Flavin, 2012; Gilens, 2005, 2012; Jacobs and Page, 2005; Rosset et al., 2013)。第三,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注意到,转型国家的政府也可能具有高度的民意回应性(Chen et al., 2016;

Distelhorst and Hou, 2017; Gorokhovskaia, 2017; Heurlin, 2016; Malesky and Schuler, 2010; Manion, 2008; Su and Meng, 2016)。这些新的研究发现启示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关注政府回应性的其他来源。

现有关于政府回应性之决定因素的研究大多关注供给侧,即比较着重探究政府官员的行为差异及其背后的动机结构。除了选举竞争压力的作用之外,学者还发现政府官员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上级监督及其晋升机会的影响(Alesina and Tabellini, 2008; Faguet, 2014)。在中国情境下,有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于涉及社会稳定的事件回应性较强(Chen et al., 2016; King et al., 2013)。既有文献的另一个视角是从政府执政能力出发来考察回应性问题,认为政府搜集信息、了解民众需求的能力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回应性水平(Distelhorst and Hou, 2017; Thornton, 2011)。例如最近文献中的实证证据表明,由于国家能力的巨大差异,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对民意的回应程度远高于肯尼亚政府(Hassid and Brass, 2014)。也有一部分研究关注政府回应性的特定制度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不少学者发现党长期坚持的群众路线能行之有效地提高政府回应性(Dickson, 2016; Tang, 2016)。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制度保证(黄宗良, 2013),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基层民主制度,以及政治协商制度都被证明能够很好地反映公民意见,参与政策决策(Cho, 2002; Manion, 2008; O'Brien, 1990)。此外,中国的信访制度也构成公民表达诉求、获取回应的有效渠道(Chen, 2012; Luehrmann, 2003)。

虽然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政府回应性的认识,但其面临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对需求侧的关注不足,较为忽略民众表达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差别。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各类新媒体的涌现为公民提供了政治表达和参与的多元空间,从而使得公民诉求更为主动且具有许多新兴的特征(Chadwick, 2006)。在这一背景下,对政府回应性需求侧的忽视将可能导致更多的理论误解与实证错误。作为对网络时代民意表达策略的初步探索,本文基于从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爬取的市民诉求帖数据,对公民网络问政的一般特征进行描述

性分析,主要关注向谁问政,问政于什么议题,以及如何问政这三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政府回应性的决定因素,尤其是考察较易获得政府回应的网络问政策略。我们希望本研究能从需求侧加深学术界关于政府回应性的理论认识,并为信息时代的公共决策过程优化提供建议。

## 二、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性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互联网技术持续发展,网民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深刻影响着政府服务,约60%的中国网民已经成为政府在线政务服务的用户。这说明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互动具有强烈的网络时代特征。

既有文献非常深刻地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公民政治生活的影响。学者的一个共识是,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为公民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网络空间的政治生活在现实社会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公民在网络上体现的政治态度,进行的政治交流及其与政府的互动,在越来越深刻地塑造着其对官员的信任,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评价,甚至选举结果(Cornfield, 2004; Wolf, 2004)。一方面,许多学者呼吁重视线上与线下政治参与在代表性上的差别,尤其是强调网络上的公民权利的排他性。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的经济与技术门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阻碍部分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壁垒,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新的政治参与不平等(Best and Krueger, 2005; Krueger, 2002; Mossberger et al., 2008);而另一方面,大量文献着力探讨互联网的“赋权”效应,认为网络能降低民众获得信息,寻求认同,甚至进行政治参与动员的成本,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公民政治表达的广度与深度,提高政治生活的活力(Zhang and Fleming,

2005; Zheng, 2007)。在中国情境下,不少研究发现互联网不仅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很好地使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工具来有意识地搜集公民意见以提供决策参考(Thornton, 2011),甚至进行社会动员以加强社会支持并维持社会稳定(King et al., 2013; Zheng, 2007)。

聚焦于政府回应性问题,由于网络时代公民与政府互动所具有的新特征,相关理论研究当然面临挑战。但从实证分析策略的角度,公民在互联网上的意见表达,以及政府对这些民意的回应,又给学者带来了相当多的研究机遇。具体来说,研究公民网络问政及其获得的政府回应,能够有效地帮助解决回应性研究之前面临的测量偏误问题。既有文献往往以公共政策与公民意见的一致程度来作为政府回应性的实证测量。但是,如何调查以及总结公民的群体性意见,以及怎样精确地捕捉公共政策的观点偏向,常常引起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从而阻碍学者就相关实证证据达成共识。但当我们以公民网络问政为研究对象时,公民的诉求及政府的回应在互联网上都有迹可循,这给数据的搜集带来极大的便利。并且,相比较于测量公共政策与群体意见之间的距离,了解公民网络问政是否得到回应要直观得多,其测量不仅更加容易,而且还相对更可靠。

出于上述原因,在最近几年的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文献中,涌现了一批基于网络问政数据来考察政府回应性的实证研究。本文的分析直接回应这一新兴的文献,试图对互联网时代民众与政府的政治互动进行初步探索。尽管从问政主体角度出发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但既有文献也提供了较多亟待验证的重要发现。例如,有学者发现集体行动的威胁以及对上级政府的申诉是比较有效的问政途径(Chen et al., 2016);又如,较近的研究指出问政者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受到网络平台特征的影响。具体来说,平台的制度化可以提升民众在与政府进行有关政策互动时的平等地位,但制度化却不能解决选择性回应的问题(张华等,2013)。只有比较少量的研究开始关注问政者的诉求表达方式的影响(孟天广和李锋,2015),但这将是本文的一个研究

重点。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出于因果推断的需要,已有的部分文献使用了田野实验的方法,通过模拟网民随机提交“假诉求”来考察政府回应性的决定因素(Chen et al., 2016; Distelhorst and Hou, 2017)。基于这类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虽然因其实验设计而更具因果逻辑性,但其外部有效性往往有限,且不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公民网络问政的事实全貌。与此对比,本文的实证分析对象是公民网络问政的真实诉求与政府回应。第二,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载体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可能呈现不同的模式。本研究关注的网络问政平台与既有文献有所差别,我们一方面选择地方性平台,另一方面选择网络留言板而非新媒体平台。

### 三、研究数据

本文旨在研究公民网络问政的策略及其与政府回应性之间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提供了非常多样化的平台——政府部门的门户网站、地方领导人的电子信箱,以及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都成了公民表达政治态度,提出政治诉求的重要渠道,这也为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回应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有关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文献中,学者主要关注全国性的网络问政数据库,而较为忽略对地方性网络问政平台的研究。既有文献有的关注人民网上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孟天广和李锋,2015; Su and Meng, 2016),有的考察市县级领导电子信箱(Distelhorst and Hou, 2017),其对政府回应性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全国性数据(Chen et al., 2016),而学术界关于地方性网络问政制度的理解却还未及实证层面。

这样的研究取向兼有利弊。一方面,全国性数据规模大、覆盖广,有助于真实描述中国网络问政及政府回应的全貌,且能提供地区之间

比较重要的信息。例如,Distelhorst 与 Hou(2017)就指出,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地方社会冲突的强度是决定政府回应性的重要指标。又如,Meng, Pan 与 Yang(2015)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深刻形塑着政府回应的选择性策略。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国家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及政府治理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全国性数据往往不能很好地区分社会情境性因素与个体问政策略对回应性的影响。简言之,地区层次的异质性可能会给基于全国数据的模型设定及诠释带来挑战。出于对既有文献的补充,我们的研究选取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由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宣传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共同主办,华龙网承办,涵盖了华龙网原有的“有问@市长在线”“阳光重庆”等问政栏目。通过这个网络问政平台,网友可向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投诉举报,以及反映所有需要政府部门协助办理的问题。作为一个典型的地方性政治互动平台,重庆网络问政平台提供的数据具有以下优势。一是该平台在重庆拥有较广泛的关注度,因而公民诉求案例体量大,议题丰富;二是该平台清晰地将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处理进度分为已受理、已转交、已回复和已解决四个节点,从而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测量政府回应性;第三,该平台的案例呈现方式既有利于我们进行数据抓取,又很好地保存了问政对象、问政时间、诉求议题等丰富信息。

在 2019 年 4 月底,我们通过网页抓取技术搜集了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之间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的所有诉求帖及其政府回应信息。我们选择抓取这 8 个月的数据,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公民发帖与政府回应之间的自然时间差,我们将 2019 年 4 月的诉求帖排除出研究范围,以避免出现政府部门因工作量大而尚未来得及处理问政帖的情况;二是为了避免样本量过大而使得常规使用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失去参考意义,我们仅仅回溯数据至 2018 年 3 月,从而将样本量控制在 10 000 以内(Lin et al., 2013)。我们的最终分析样本包含在这 8 个月之内网民发起的 8 928 条有效问政帖。

## 四、描述性统计

在探讨政府回应策略的决定因素之前,我们先对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的诉求帖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反映地方网络政治互动的一些一般性特征。我们试图从实证层面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重庆公民网络问政的主要对象是谁?公民的诉求集中在哪些议题?以及,公民网络问政的主要方式和策略如何?

### (一) 网络问政对象

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的“问政面对面”栏目详细列举了公民可以向之咨询、投诉和建议的问政对象,包括36个部委办局与40位区县领导<sup>①</sup>。表1显示,在本文研究所覆盖的8个月内,网民向重庆市各部委办局提出诉求1254条,占诉求帖总数的大约14%,而向各区县政府发帖提出诉求达7674条,约占86%。公民网络问政主要诉诸区政府而非部委办局,这可能是由于网民对于自身诉求所涉及的部委分局并不总是十分明确,且许多诉求可能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协同处理,因而直接向区县领导问政可能更为方便。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的行政体制改革着力于提高“一网通办”能力,强调政务服务的一体化,我们的分析从侧面说明这一改革导向非常切合公民的实际诉求,应当能大大提高政府的回应性与服务效率(陈广胜,2017)。

表1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对象

	部委办局 (条)	百分比 (%)	主城九区 (条)	百分比 (%)	其他区县 (条)	百分比 (%)	总计 (条)
8月	178	14.44	466	37.79	589	47.77	1233
9月	152	14.10	418	38.78	508	47.12	1078

<sup>①</sup> 详细列表参见 <http://cq wz.cqnews.net/ask/obj>, 2019年8月22日最后一次访问。

续表

	部委办局 (条)	百分比 (%)	主城九区 (条)	百分比 (%)	其他区县 (条)	百分比 (%)	总计 (条)
10月	137	14.50	363	38.41	445	47.09	945
11月	126	12.75	419	42.41	443	44.84	988
12月	184	16.53	462	41.51	467	41.96	1 113
1月	189	15.27	540	43.62	509	41.11	1 238
2月	136	14.61	341	36.63	454	48.97	931
3月	152	10.84	671	47.86	579	41.30	1 402
总计	1 254	14.05	3 680	41.22	3 994	44.74	8 928

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

在以区县政府为对象的问政帖中,向主城九区政府提出诉求的约占48%(41.22/85.95),向郊区及下辖县政府提出诉求的则占52%。<sup>①</sup>考虑到主城九区常住人口仅占重庆市总人口的28%<sup>②</sup>,表1的描述性统计说明:在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行政服务的复杂性也较强,公民可能有更多的诉求需要及时得到政府回应。表1也显示,各级问政对象的分布在我们样本所覆盖的8个月内没有呈现较大的波动。唯一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3月以市局机关为问政对象的诉求帖仅占11%,而89%的问政帖都是针对各区县政府的,尤其是主城九区政府回应网民诉求的压力比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城区市民在2月春节期间,由于返乡或者外出旅游而积累了一些诉求与问题,从而在3月间集中发帖处理的结果。

在总计1 254条以市局机关为问政对象的公民发帖中,表2列举了被问政次数最多的8个部委办局,它们分管着交通、社会保障、教育、房产、治安、卫生、工商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要社会生活领域。这些

<sup>①</sup> 重庆主城九区包括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北碚区、渝北区和巴南区。

<sup>②</sup> 2018年重庆市常住人口为3 102万人,其中主城九区常住人口为875万。

部委办局承担的问政服务占有以市局机关为问政对象的诉求帖总数的 85%，其中尤其以市交通委员会及执法总队，以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回应力最大，它们分别承担了约 44% 和 15% 的问政任务。在政务服务一体化的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针对市民诉求众多、政务回应压力较大的领域，单独开设更为方便的问政渠道，提高政府响应能力。

表 2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对象中的部委办局分布

部委办局	发帖量(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市交通委员会与执法总队	555	43.61	43.6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93	15.39	59.00
市教育委员会	93	7.41	66.41
市国土房管局	59	4.70	71.11
市公安局	52	4.15	75.26
市建委	46	3.67	78.93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44	3.51	82.44
市工商局	38	3.03	85.47
其他	174	14.53	100
总计	1 254		

对于总计 7 674 条以区县政府为问政对象的公民发帖，重庆公民网络问政的频次大致与所在区县的城市化率、人口总量及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除辖区面积较小的渝中区和在大渡口区之外，重庆主城区政府的公民问政响应压力要远远大于郊区和下辖县市，其网民在 8 个月内的发帖数量都在 300 条以上。同时，在经济总量较大且人口众多的万州区、合川区及江津区，以区政府为问政对象的发帖数量也较多，都在 250 条以上。一个较为意外的发现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其县政府在我们样本所覆盖的 8 个月内收到问政帖达

217条,这提示我们公民网络诉求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呈现U型关联——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城市行政服务的复杂性,较高的网络覆盖率,以及公民较好的教育水平,市民网络问政的发生率可能比较高;但同时,在经济特别欠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冲突水平较高,且民众行政服务需求更为急迫,因而政府的网络问政响应压力也会比较大。之后的研究可以通过全国性数据来进一步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与网民的问政诉求之间的关系(Distelhorst and Hou, 2017)。

我们进一步考察酉阳县政府收到的217条问政帖,发现网民的问政诉求集中于几个核心议题。一是民众对于国家各项扶贫资金的分配情况有疑虑,网络问政往往是关于贫困户的认定,生活补助的发放等问题(45条);二是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酉阳县基础设施建设还较为薄弱,民众关于城乡道路、用水、照明等公共服务提出了较多诉求(61条);三是在酉阳县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及贫困社区的整体搬迁问题,因而群众的问政诉求也随之增加(38条)。这三项议题总计引起民众问政发帖达144条,约占总问政帖的66%。

## (二) 网络问政议题

参考孟天广和李锋(2015)关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公民网络问政议题的分析,我们在表3中总结了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主要议题分布。在我们的样本中,有约28%的诉求帖(2542条)涉及多重议题。例如,网民可能在反映环境污染问题时,提出某项改进市政建设以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案。为了使数据分析结果更符合现实状况,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不设定议题之间的排他性,即一条发帖可能属于多个议题。表3显示,交通、市政建设、社会治安、教育和就业问题是网民问政的重点,其8个月内发帖量都超过1000条,占比都达10%以上。网民对于交通问题的关注度尤其高,8个月内问政帖达2697条,占总帖数的30%以上。这与表2的发现相一致,都说明交通管理和执法部门回应网民问政的巨大压力。

表 3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议题分布

	交通	市政建设	社会治安	教育	就业	企业事务
发帖数 (条)	2 697	1 577	1 541	1 390	1 284	846
百分比 (%)	30.21	17.66	17.26	15.57	14.38	9.48
	拆迁征地	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	农村农业	贪污腐败	文化娱乐
发帖数 (条)	689	531	415	185	180	153
百分比 (%)	7.72	5.95	4.65	2.07	2.02	1.71

表 3 展示的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的公民诉求议题分布,与之前的研究反映的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非常不同。例如孟天广和李锋(2015)发现,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最具公民关注度的议题是农村农业、就业和贪污腐败。这说明,网民的诉求可能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不同地区的民众因各地经济发展和行政服务的水平不同,关心的议题也可能大相径庭。重庆网民的问政议题,主要集中于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因而改善市政建设、方便交通出行,保障城市治安,以及提高教育投入和均等化应当是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在全国性的网络问政平台上,公民关心的议题则更具政治性,例如农村农业健康发展与政府廉政建设等。可见,不同层级的政府响应民众需求的侧重点也应当有所不同。

### (三) 网络问政策略

以往有关网络问政的研究大多关注政府部门响应诉求的选择性,例如考察政府倾向于答复何种议题而回避哪些议题,或者研究哪些区域的地方政府响应性更好,而忽视了网民问政的主动策略。然而事实上不难想象,网民在问政平台发帖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考虑何时发帖较为妥当,如何措辞更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等策略问题。

图 1 描述了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时间分布。左侧的时间趋势图显示,10 月是 2018 年下半年网民问政的低谷期,总发帖量不足 1 000 条。

之后随着农历年底的临近,市民网络问政数量逐步增加,在1月达到高峰。春节期间市民网络问政的活跃度大大降低,然而在春节过后的3月,网民可能集中性地提出由于春节假期而被搁置的诉求,平台发帖量达到1400条以上。政府部门回应网民发帖的时间趋势也大致如此。在各个月份,政府对问政帖的回应比率都比较均衡,平均约为54%左右。横向对比其他关于政府回应性的研究,我们发现重庆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响应率要略高于各地市长信箱(Distelhorst and Hou, 2017),及人民网地方领导人留言板(Su and Meng, 2016)。从国际比较的眼光看,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的政府响应率,高于一些研究所提供的美国国会及立法会对民意的响应比率(Broockman, 2013; Butler et al., 2012),也高于帕特南(Putnam, 1993)报告的意大利地方官员的民意响应率。与近来的许多文献发现一致,连任压力并不是政府回应性的唯一可能来源。图1右侧的折线图则说明,无论是网民发帖还是政府回应,都集中在工作日内完成,周末期间无论是发帖数量还是回复数都大大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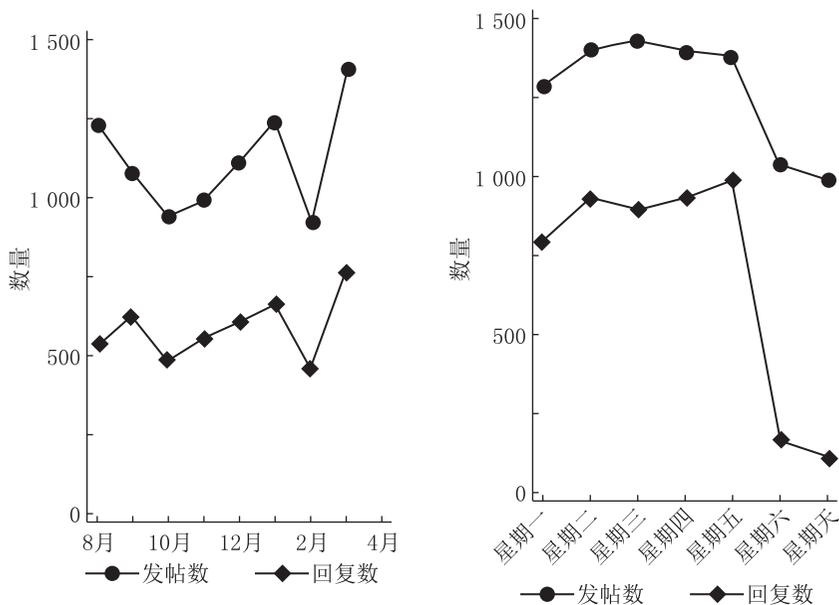


图1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与政府回应的时间分布

图 2 按关注议题总结了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帖子的文本长度及获取的点击量,横轴上的议题按网民关注度由高至低排列。图 2 显示,网民对议题的关注度大致与发帖的文本长度呈负相关:对于交通、市政建设、社会治安和教育这类发帖量特别高的议题,网民的帖子往往较为简短就能说明问题;而关于就业、企业事务、拆迁征地、医疗卫生与环境保护的帖子则相对较长。网民或许是需要较长的文本才能清晰地描述自己的疑问和诉求,也可能会策略性地选择较长的文本来争取关注。有关这九类议题的发帖,获取的点击量都相对平均。平均最长的问政帖是关于农村农业与贪污腐败问题的,但相比较而言,作为问政平台访客的网民对贪腐问题最感兴趣,这类帖子的点击率极高,平均近 1 800 次点击,而网民对农业农村问题的点击量则最低,平均约为 900 次。我们简单地考察文本长度与点击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帖子长度每增加 1 个字时,点击量会上升 0.36 次。可见网民的问政策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诉求描述更相信的问政帖会增加访客网民对事件的关注,从而可能影响政府的回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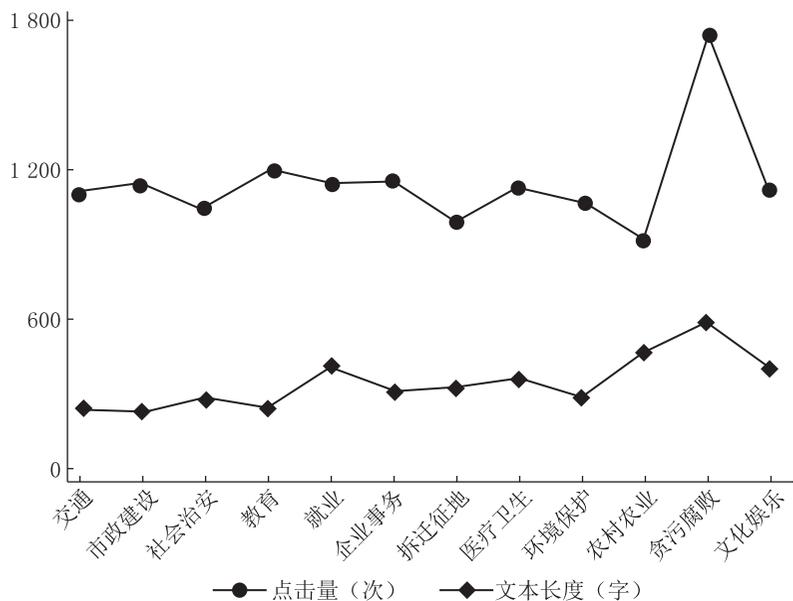


图 2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文本长度及被关注度

图3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重庆网民的问政策略——问政帖是聚焦于单一议题,还是同时涉及多个议题;以及网民在提出诉求时,是代表某个集体的利益,还是仅代表个人。同样,我们将横轴上的议题按网民的发帖总量从高到低排列。图3显示,有关市政建设、交通、拆迁征地及企业事务的发帖往往在议题上比较集中,其超过一半的帖子都只涉及单一议题。而关于就业、医疗、农村农业和贪污腐败的发帖则会更多地牵涉其他议题,其中约60%以上的帖子会涉及多重议题。网民在问政有关交通、市政、环境和文化娱乐问题时,超过80%的帖子会在文本中强调这些问题关于许多的集体利益。在就治安、教育、农村农业和贪腐问题发帖时,也有超过一半的帖子会站在维护集体利益的立场上。网民关于其他议题的问政则显得比较个体化,超过一半的帖子基本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描述行政服务的问题及公民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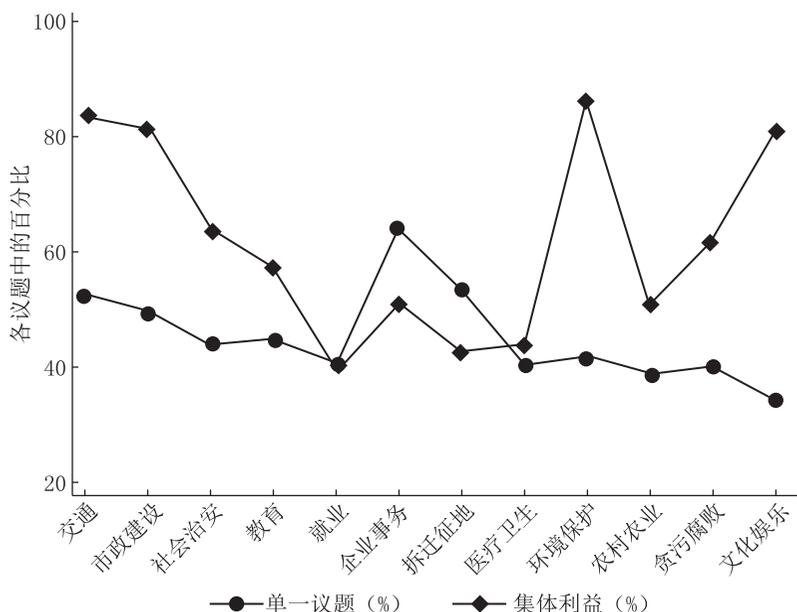


图3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主要议题及表达策略

## 五、实证结果

本节基于多变量回归的方法考察 8 928 条问政帖获得政府回应的情况。我们的因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以 1 来表示网民的发帖获得了政府回应,而 0 代表在至少一个月并未获得政府回应。<sup>①</sup>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将帖子标记为已受理、已转交、已回复和已解决四种状态,其中,已受理和已转交表示问政帖已被交由相关部门等待处理,而已回复与已解决才表示网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诉求得到了处理。因而,我们将已受理和已转交状态标记为暂未得到回应,而将已回复和已解决状态定义为得到政府回应。我们的多变量分析通过累加模型的方式,分别探讨问政对象、问政议题及问政策略对获得政府回应的不同影响。采用逻辑斯蒂模型,我们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预测政府回应性的逻辑斯蒂模型

	因变量:政府回应性(是=1)			
	(1)	(2)	(3)	(4)
对象(部委办局)				
主城九区	2.222*** (0.077)	2.219*** (0.079)	2.242*** (0.079)	2.237*** (0.079)
其他区县	1.097*** (0.075)	1.102*** (0.077)	1.137*** (0.077)	1.142*** (0.077)

<sup>①</sup> 一个月的时间选择可能是比较武断的,政府部门当然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对问政帖给出回应。但是,一方面我们在爬取数据之时截掉了近一个月的问政帖;另一方面,我们的数据显示,在 4 818 条得到回应的问政帖中,有约 98% 的帖子都是在一个月之内得到了回复。这说明等待超过一个月而得到政府回应是非常小概率的状况。

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性(是=1)			
	(1)	(2)	(3)	(4)
议题(交通)				
市政建设		0.114 (0.088)	0.104 (0.088)	0.042 (0.090)
社会治安		-0.093 (0.093)	-0.075 (0.093)	-0.118 (0.095)
教育		0.193** (0.092)	0.196** (0.092)	0.138 (0.096)
就业		-0.281*** (0.091)	-0.236** (0.092)	-0.299*** (0.099)
企业事务		-0.414*** (0.097)	-0.384*** (0.098)	-0.418*** (0.101)
拆迁征地		-0.027 (0.106)	0.010 (0.106)	-0.039 (0.111)
医疗卫生		-0.016 (0.116)	0.030 (0.117)	-0.052 (0.123)
环境保护		-0.035 (0.124)	-0.014 (0.124)	-0.127 (0.128)
农村农业		0.245 (0.173)	0.323 (0.189)	0.230 (0.179)
贪污腐败		-0.405** (0.168)	-0.343** (0.172)	-0.434** (0.176)
文化娱乐		0.147 (0.187)	0.212 (0.189)	0.090 (0.192)
其他议题		-0.294*** (0.093)	-0.297*** (0.093)	-0.271*** (0.097)

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性(是=1)			
	(1)	(2)	(3)	(4)
文本长度(百字)			-0.029*** (0.008)	-0.036*** (0.009)
被关注度(百次)			0.009*** (0.002)	0.009*** (0.002)
单一议题				-0.214*** (0.058)
集体利益				0.115** (0.051)
样本量	8 928	8 928	8 928	8 928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模型(1)单独考察不同问政对象的回应性差别。结果显示,相比于部委办局,区县政府对网络问政帖的回应性更强,尤其是主城九区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响应率最高。具体来说,以主城九区政府为问政对象的问政帖,获得政府回应的发生比为以部委办局为对象的帖子的9倍,其他区县政府回应网络问政帖的发生比也比部委办局大约2倍。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对网络问政回应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其所面对的议题处理难度不同,也可能反映了不同部门之间了解并回应民众需求的能力差异,当然也受到各政府部门涉及网络问政的工作总量与工作队伍规模的影响。囿于地方性数据的限制,我们不能检验政府回应性如何与一系列的地区人口、经济、政治等指标相关联,但这是关注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研究正逐步探索的话题(Distelhorst and Hou, 2017)。当我们进一步控制问政议题和网民的发帖策略之后,表4的后续模型显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回应性差异仍然稳健。后续的研究可以着力讨论这些回应性差异的决定因素,以提出有关提高政府部门回应性的有效政策建议。

模型(2)进一步控制了网民发帖问政所关注的议题。<sup>①</sup>我们以交通议题为参照组,并且将那些无法进行有效分类,且不属于表3归纳的任何议题的帖子都定义为“其他议题”。模型(2)显示不同议题所获得的回应性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大部分议题的回归系数都比较小,且在统计学意义上也并不显著。本文的这一发现,挑战了之前关于中国政府选择性地回应公民诉求的研究结论。当然,不同社会群体诉诸网络问政的需求应该具有系统性的差别,政府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问政行为是否选择性回应,还需要进一步搜集问政主体层面的数据来进一步讨论。模型(2)的结果也显示,相比于涉及交通问题的问政帖,有关教育的问政帖获得政府回应的可能性更高,其发生比约高出21%。另外,有关就业、企业事务和贪污腐败的议题获得回应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有关交通的问政帖,其回应发生比分别比交通议题少24%,34%和33%。对于那些不易进行归类的有关其他议题的问政帖,政府的回应性也相对较低,其回应发生比之交通议题少25%。

当我们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一步控制发帖人的问政策略时,相关议题的回归系数无论是在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上,都不呈现明显的变化,这说明模型(2)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有关教育问题的诉求更易获得回应,这可能是由于教育相关的政策和规定都相对清晰,政府部门从而可以更容易地给予明确回复。而政府部门对于有关就业和企业事务的问政帖回复率较低,可能是由于这类议题的个体化程度比较高,不同案例的具体情况有较大差别,政府部门较难给予比较统一的政策性回复。而有关贪腐的问政帖较难得到及时反馈,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对于公众有关贪腐问题的投诉举报,政府部门需要经过严谨的取证验证程序才能给予公正准确的回复。除了这些回归系数呈统计显著的议题之外,其他议题得到政府回应的发生比几乎没有显著差别。有关政府选择性回应公民诉求的结论,似乎还需更多的实证论证和理

---

<sup>①</sup> 对于问政帖涉及多重议题的情况,我们按照其诉求涉及的最重要议题进行分类。

论商榷。

模型(3)在控制问政对象和问政议题的基础上,考察问政帖的文本长度与被关注度对于其获得回应的影响。虽然我们在之前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帖子长度与点击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它们对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却恰恰相反。模型(3)的结果显示,当问政帖的文本增加1000个字时,其获得政府回应的发生比将降低25%。因为在我们的样本中,问政帖的平均文本长度为大约210字,因而模型(3)的结果说明,虽然文本长度对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但其影响规模却比较小。与之相反,获平台访客点击量越高的问政帖则越容易得到政府回应,当访客点击量增加100次,则帖子获得政府回应的发生比会增加1%。由于问政帖点击量的样本平均数约为1100,模型(3)的结果说明,当访客点击量平均增长10%时,政府回应的发生比会降低大约1%。可见公众关注度对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不仅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在经济学意义上影响效应也较可观。总体来看,在问政对象和问政议题一致的情况下,那些用较为简短的文本即能获得大量点击的问政帖,最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复。文本简短可能说明发帖人的诉求明确,且涉及的问题较为简单明了;点击量大,则说明发帖人的诉求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可能涉及重要的民生问题,两者都能提高政府的回应性。

在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进一步控制发帖人的问政策略,考察帖子涉及议题的数量以及其利益出发点对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于有关单一议题的问政帖,那些涉及多重议题的问政帖更容易得到回复。并且,发帖人在问政帖中诉诸集体利益的视角,有助于提高政府对帖子的回应性。模型(4)的结果说明,政府部门更倾向于优先回复那些影响到市民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且与多数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民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有关“问政策略”的相关发现,应当作为一种描述性结论来理解。我们的数据显示政府倾向于回应那些文本简短但却能引起关注,涉及多重议题并且诉诸集体利益的问政帖。然而在现实中,公民的问政需求可能是特定的,公民是否能够实践这些

“问政策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诉求及其在网络上的个体表达和动员能力。换言之，即使存在一种获取政府回应的理想策略，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了解并实践这种策略，将构成网络时代民意表达的另一层不平等问题。

除了考察政府部门是否回应公民诉求，我们还进一步将研究样本限制为得到回应的问政帖，以考察政府部门对公民诉求的响应时间。对于 4 818 条得到回应的问政帖子，问政人平均需要等待 7.5 个自然日才会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政府回应所需的天数呈非常明显的偏态分布，在最终得到回应的问政帖子中，90% 的等待回复时间都在半个月以内。但另外 10% 的帖子得到回应的时长差异则非常大，最多可达约 5 个月。为了排除这一偏态分布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对政府响应时间取对数，再以一般线性回归重复表 4 中的模型，以考察问政对象、问政议题和问政策略对于政府响应时间的影响。回归结果报告见表 5。

表 5 预测政府回应时间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因变量:政府回应时间(取对数)			
	(1)	(2)	(3)	(4)
对象(部委办局)				
主城九区	0.284*** (0.066)	0.283*** (0.067)	0.273*** (0.068)	0.277*** (0.068)
其他区县	0.237*** (0.068)	0.242*** (0.069)	0.228*** (0.070)	0.234*** (0.070)
议题(交通)				
市政建设		0.068 (0.057)	0.072 (0.057)	0.054 (0.058)
社会治安		0.054 (0.061)	0.051 (0.061)	0.035 (0.062)

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时间(取对数)			
	(1)	(2)	(3)	(4)
教育		-0.055 (0.058)	-0.059 (0.058)	-0.082 (0.061)
就业		-0.069 (0.064)	-0.099 (0.064)	-0.126* (0.069)
企业事务		0.056 (0.067)	0.034 (0.067)	0.017 (0.069)
拆迁征地		-0.042 (0.072)	-0.059 (0.072)	-0.082 (0.076)
医疗卫生		-0.019 (0.079)	-0.055 (0.079)	-0.086 (0.084)
环境保护		0.070 (0.080)	0.059 (0.080)	0.030 (0.082)
农村农业		0.080 (0.112)	0.040 (0.112)	0.007 (0.115)
贪污腐败		0.169 (0.126)	0.094 (0.127)	0.063 (0.129)
文化娱乐		0.130 (0.116)	0.076 (0.116)	0.038 (0.119)
其他议题		-0.113* (0.067)	-0.108 (0.067)	-0.108 (0.069)
文本长度(百字)			0.020*** (0.005)	0.018*** (0.005)
被关注度(百次)			-0.000 (0.001)	0.000 (0.001)

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时间(取对数)			
	(1)	(2)	(3)	(4)
单一议题				-0.059 (0.038)
集体利益				0.002 (0.035)
确定系数	0.004	0.008	0.011	0.011
样本量	4 818	4 818	4 818	4 818

\*\*\*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模型中包含常数项

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于部委办局,主城区和区县政府的网络问政回应概率虽然更高,但是其回复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模型(1)的结果,主城九区对网络问政的响应时间要比部委办局多约 33% ( $e^{0.284} - 1$ ), 区县政府的响应时间则比部委办局多约 27% ( $e^{0.237} - 1$ )。主城九区与区县政府在响应时间上的差异则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 $p = 0.143$ )。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之间保持稳定。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发现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在回应概率以及响应时间上的差异,仅仅只能作为一个描述性结果进行参考。在没有使用全国性的数据,控制一系列的地方宏观人口结构和经济政治指标进行数据分析之前,对于不同政府部门行为逻辑的推论应该保持充分谨慎。

不同议题得到政府回应所需的时间差异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模型(4)显示政府回应就业相关问政帖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但这一结果在不同模型设定之间并不稳健,且在模型(4)中也仅仅是边际显著的。真正影响政府回应效率的可能是帖子的长度,模型(3)和(4)显示,当帖子长度增加一百字,则政府回应的的时间会延长 2% 左右 ( $\exp^{0.02} - 1$ ),这一效应虽然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但是其“经济意义”上则很难说是显著的——长帖虽然会延迟政府回应的的时间,但这一影响效应比较微小。除此之外,实证分析并未发现帖子点击量、涉及议题数量,以及利益出

发点对政府响应效率的显著性影响。总体来看,网络问政主体的问政策略,似乎比较明显地影响了政府部门回应与否的决定,而政府部门一旦回应,这类问政策略对于其响应效率则并不产生重要影响。

## 六、研究结论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接收并理解群众的诉求,有效地与群众充分沟通,并作出及时回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政务的飞速发展,网络问政平台为政府与群众的互动提供了一个高效公开的平台。基于从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所爬取的8928条帖子及其政府回应数据,本文试图描述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一般特征,并初步考察政府回应性的决定因素。

我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以下发现:首先,一般市民因为难以判断其诉求议题涉及的政府部门,因而偏好直接向区县政府领导问政。其次,公民问政的频率与其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正向相关,在经济发达、城市化率较高,以及经济极其落后,社会福利分配矛盾较为尖锐的地方,民众会有更多的诉求需要政府予以回应解决。第三,公民在地方性问政平台上集中关注的议题与全国性问政平台有较大差异,主要以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等诉求为主,政治性诉求不占主流。政府与公众在地方问政平台上的互动依然属于群众投诉而后政府解决的模式,公民并不倾向于选择地方性平台进行参政议政。第四,总体来看,重庆市政府对公民网络问政的回应性较高,其问政平台诉求帖的答复率高于全国性问政平台及市长信箱,也高于既有文献所报告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回应率数据。

在此基础上,使用多变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政府回应性的决定因素。从问政对象角度看,越是基层的政府部门,其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越高。这可能说明,基层政府更为贴近群众日常生活,更为了解民众具体诉求,因而更易于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此外,与既

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相一致,本文的实证分析说明政府在回应网民诉求时,在不同的议题之间并不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换言之,市民关心的各项议题都能很好地被传达至政府部门,并得到积极响应。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初步展现了公民在网络空间进行诉求表达的有效策略。在问政对象和问政议题都一致的情况下,那些用简短文本即能获得大量点击的问政帖最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复。同时,涉及多重议题且诉诸集体利益的问政帖,其政府答复率也相对较高。一方面,政府部门更倾向于优先回复那些多维度影响市民社会生活的重要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公民自身对相关政策的认识与理解越丰富,则其诉求越清晰,也越容易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可见要提升政民互动,不仅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也要加强公民的政治意识教育,让群众关注政策、理解政策。同时,政府公职人员也应该提升服务理念,尤其是加强与面临政治参与困难的民众的互动,从而与公民协作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

## 参考文献

陈广胜:《以“互联网+”撬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浙江政务服务网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1期。

黄宗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经验和制度保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张华、仝志辉、刘俊卿:《“选择性回应”:网络条件下的政策参与——基于留言版型网络问政的个案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3期。

Adams, J., & Ezrow, L. (2009). Who Do European Parties Represent? How Western European Parties Represent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Opinion Leader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1(1), 206—223.

Alesina, A.F., & Tabellini, G. (2008). Bureaucrats or Politicians? Part II: Multiple Policy Task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3), 426—447.

Bartels, L.M.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er, C., & Mitchell, N. (2004).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Mexican States: Elections or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8(2), 293—312.

Bernauer, Julian & Giger, Nathalie & Rosset, Jan. (2015). Mind the gap: Do Proportional Electoral Systems Foster a More Equal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Men, Poor and Ric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1), 78—98.

Besley, T.K., & Burgess, R. (2001). Political Agency,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the Role of the Medi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4), 629—640.

Besley, T. J., & Burgess, R. (200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Best, S. J. & Krueger, B. S. (2005).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4), 629—640.

Broockman, D. E. (2013). Black Politicians Are More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to Advance Blacks' Interests: A Field Experiment Manipulating Political Incen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3), 521—536.

Dickson, B. J. (2016).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D.M., Karpowitz, C.F., & Pope, J.C. (2012). A Field Experiment on Legislators' Home Styles: Service versus Poli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4(2), 474—486.

Chadwick, A. (2006) *Internet Politics: States, Citizens,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 X.S. (2012). *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 J., Pan, J., & Xu, Y. (2016).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0(2), 383—400.

Cho, Y. (2002). From “Rubber Stamps” to “Iron Stamps”: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Supervisory Powerhouses. *The China Quarterly*, 171, 724—740.

Cleary, M.R. (2007). Electoral Competition,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Mexico.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2), 283—299.

Cornfield, M. (2004). New and Improved. *Campaign & Elections*, 25, 42.

Dahl, R.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L.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istelhorst, G., & Hou, Y. (2017). Constituency Service under Nondemocratic Rule: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9 (3), 1024—1040.

Faguet, J. P. (2014).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World Development*, 53(1), 2—13.

Flavin, P.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0(1), 29—59.

Gilens, M. (2005).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9(5), 778—796.

Gilens, C. (2012).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rokhovskaia, Y. (2016). Testing for Sources of Electoral Competi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n Analysis of Russia’s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1—14.

Grimes, M.K., & Esaiasson, P. (2014).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 Democratic Value with Negative Externalit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7(4), 758—768.

Heurlin, C. (2016),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bolt, S.B., & Klitgaard, M.B. (2008).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3), 309—337.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02), 326—343.

Krueger, B. S. (2002).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source Approach.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0(5), 476—498.

Kuklinski, J. H., & Stanga, J. E. (197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 Behavior of California Superior Cour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4), 1090—1099.

Lin, M., Lucas, H.C., & Shmueli, G. (2013), Research Commentary—Too Big to Fail: Large Samples and the P-Value Problem.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4(4), 906—917.

Luehrmann, L. M. (2003). Facing Citizen Complaints in China, 1951—1996. *Asian Survey*, 43(5), 845—866.

Malesky, E., & Schuler, P. (2010). Nodding or Needling: Analyzing Delegate Responsiveness in An Authoritarian Parlia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3), 482—502.

Manion, M. (2008). When Communist Party Candidates Can Lose, Who Wins? Assessing the Rol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the Selection of

Leader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607—630.

Mossberger, K., Tolbert, C. J., & Mcneal, R. S. (2008). *Digital Citizenship: The Internet, Society and Participation*. *Digital Citizenship: The Internet, Society, and Participation*.

O'Brien, K. J. (1990).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obs, L. R., & Page, B. I. (2005). Who Influences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1), 107—123.

Powell, G. B. (2000).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 Limongi, F. (1993).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3), 51—69.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et, J., Giger, N., & Bernauer, J. (2013). More Money, Fewer Problems? Cross-Level Effects of Economic Deprivation 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36(4), 817—835.

Selden, S. (1997). *The Promise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Diversity and Responsiveness in a Government Agency*. Armonk: M.E. Sharpe.

Speer, J. (2012).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Reform: A Good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World Development*, 40(12), 2379—2398.

Steven, L. (2004). Dean's Net Effect Is Just the Start. *Newsweek*, 143, 73.

Su, Z., & Meng, T. (2016). Selective Responsiveness: Online Public Demand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 Authoritari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9, 52—67.

Thornton, P. (2011). Retrofitting the Steel Frame: from Mobilizing the Masses to Surveying the Public. In E. J. Perry & S. Heilmann (Ed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Asian Studies.*

Shapiro, R. Y., Verba, S., Schlozman, K. L., & Brady, H. E.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nfang, T. (2016).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G. (2004). Weapons of Mass Mobilization. *Wired*, 12(9), 131—137.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2.09/moveon.html>.

Zhang, E., & Fleming, K. (2005). Examin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News Media Under Censorship: A Content Analysis of Selected Chinese Newspapers' SARS Coverag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3), 319—339.

Yongnian, Z. (2007).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